

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問題之言論分析  
—並論近代思想史上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

張裕亮撰

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

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問題之言論分析  
——並論近代思想史上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

指導教授：王 洪 鈞 先生  
潘 家 慶 先生

研究 生：張 裕 亮 撰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

## 謝 謩

論文的完成，在內容指正、  
資料搜集、以及謄寫付梓上；有  
太多的師長、同儕、朋友、家人  
以及個人的心血。我衷心感謝他  
們。

## 論 文 提 要

基本的研究主旨，是對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言論，作一徹底檢討。同時將此一論戰，置放在百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史的歷史架構上，才可以掌握到文星雜誌中西文化論戰的起因及歷史意義，因此探討的範圍顯然要涉及近代思想史上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言論。

第二章提出近代思想史上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。討論的重點是張之洞「中體西用說」，十教授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」，胡適、陳序經「全盤西化說」，並從世界體系理論（world system theory）探討其時代背景。

第三章進入論文主題。討論李敖「全盤西化論」，胡秋原「超越前進論」，並從依附理論（dependency theory）探討其時代背景。

第四章從文化整體性及文化變遷（cultural change）觀點，對中西文化論戰作一總評。

第五章結論。指出文化問題的討論，必須具備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，才能從文化論戰的迷霧，看出一個清徹的方向。

# 目 錄

|  |    |
|--|----|
| 第一章 緒論   | 1  |
| 第一節 研究主旨   | 1  |
|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 | 4  |
|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 | 6  |
| 第二章 近代思想史上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第一節 時代背景——從世界體系理論 (world system theory) 探討                 | 11 |
| 第二節 中西文化問題的起因  | 19 |
| 第三節 「本土運動」(Nativistic Movements) ——<br>——一個了解中西文化論戰各種觀點的概念 | 24 |
| 第四節 奚訏、倭仁關於中西文化的論辯——中西文<br>化論戰的首次交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8 |
| 第五節 張之洞「中體西用說」以及十教授「中國本<br>位的文化建設宣言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1 |
| 第六節 胡適、陳序經的「全盤西化說」   | 34 |
| 第三章 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  | 45 |

|  |     |
|--|-----|
| 第一節 時代背景——從依附理論 ( dependency theory ) 探討 | 45  |
| 第二節 文化論戰的起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3  |
| 第三節 李敖的「全盤西化論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6  |
| 第四節 胡秋原的「超越前進論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7  |
| 第五節 文化論戰的尾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75  |
| <br>第四章 中西文化論戰的總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7  |
| 第一節 從文化整體性觀點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7  |
| 第二節 從文化變遷 ( cultural change ) 觀點評估       | 94  |
| 第一項 何謂文化變遷 ( cultural change )           | 95  |
| 第二項 對「中體西用說」「超越前進論」的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| 101 |
| 第三項 對「全盤西化說」的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8 |
| <br>第五章 結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1 |
| <br>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1 |

# 第一章 緒論

中西文化與五四思潮的各種問題，歷年來在國內討論的不能算不多；但，似乎多不出口號或隨感式的範圍，好像要為桑他耶那（George, Santayana.）所說的一句名言——那些對於過去無知的人，命中註定要重複其錯誤——提供證據似的；前些年，台灣文化界又重新出現了關於「全盤西化」的論戰——餘波到現在好像還在一些青年的心中蕩漾。當時參加辯論的人物與五四時代和三〇年代的人物大都不同了，說話的格調也變了；但，思想的內容却仍未超出五四時代與三〇年代的範圍。五四時代的思想內容與範疇為何在國內產生如此重大的壓力，的確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。

——林毓生（註①）

## 第一節 研究主旨

六〇年代在文星雜誌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問題，其導火線是胡適在文星五〇期發表的「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」一文。此文一出，緊接著文星五一期，登出胡秋原的「超越傳統派 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」，五二期登出李敖的「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」。於是一場中西文化論戰的紛爭，於焉開始。

這一場中西文化論戰的紛爭，其導火線雖然是由於胡適發表的「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」一文。然而將這場論戰的始末，置放在中西文化百年來互相對壘，相互影響的歷史背景來看，可以發現到一條極為

清晰的脈絡。那就是這場中西文化論戰，基本上是承續著自清末恭親王奕訢和大學士倭仁的論辯開始，下迨張之洞的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折衷論點，以迄胡適、陳序經的「全盤西化」主張而來。

事實上，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爭論，從大學士倭仁於一八六七年上給同治皇帝的奏摺算起，到現在已經超過百年了。在這麼長久的論爭中，有傳統主義者的回向源頭論，有中體西用論，有本位文化論，有全盤西化論，真是五花八門，種類繁多。在這麼多的爭論之中，大家都忙著各抒己見，或者批評對方。

例如，張之洞的「中體西用說」，胡適、陳序經的「全盤西化論」，為什麼在當時能夠受到歡迎，而事實上只是一種特殊的心理反應模式呢？

再如文星雜誌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，李敖的「全盤西化說」以及胡秋原的「超越前進論」，究竟又是代表著什麼，是一種科學的論證，還是如前所言，一種特殊的心理反應模式罷了。

筆者長久以來，對於探討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文化，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下，所產生的各種言論，一直抱持著濃厚的興趣。在接觸文星雜誌之後，對於其中刊登有關中西文化論戰各方論點，始則為其深深吸引，繼則深感困惑，於是就在這種追根究底的驅策下，展開本論文的寫作。

基本的研究主旨，就是要對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言論，作一徹底的檢討。而且正如前面所言，將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，置放在百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史的歷史架構上，便可以掌握到文星雜誌中西文化論戰的起因以及歷史意義，而且也唯有如此，才能夠捕捉到論戰的歷史脈絡。因此，探討的範圍顯然要涉及近代思想史上，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言論。此處對近代思想史的精確分期，引自郭湛波著「近代中國思想史」一書。（註②）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，對這些中西文化論戰的各種論點，予以批判，期望能對釐清文化論戰觀點

作一些努力。

## 第二節 研究方法

一般研究傳播媒介的內容，大都採取內容分析法（content analysis），制定一些類目（item）或項目（category）做為劃分內容的指標，然後進行量的分析或質的分析。這種分析媒介內容的方法適合於說服性傳播（persuasive communication）或新聞內容的分析，但是，不適合用來研究思想性內容。

因為內容分析法，在用來分析思想性媒介時，有兩個無法克服的缺憾：

(一) 傳播內容與傳播者的思想，其意圖是分不開的。傳播者獨特的思想、意圖，不僅可能對詞語賦予不同的含意，而且傳播者會視傳播對象的不同，使用不同的方法來組織他的傳播內容。舉例來說，以商業為目的的雜誌，一定以「讀者的好惡為好惡」，以政論為目的的雜誌，重在表達編者的觀念，必要時可能以特定人物為對象，傳達某種政治意見；這兩種型態的雜誌，即使是處理同一種題材的文章、措詞，立意一定大有區別。

但內容分析研究法，基本上是把傳播內容獨立於傳播者之外，依據語詞的客觀意義來進行研究，研究結果很可能方鑿圓枘，與實際意義並不相符合。

(二) 「任何思想觀念背後，都有一股集體勢力（collective force），集體勢力的觀點、利益及目標，藉此思想觀念表達出來」（註③）。現代大眾媒介的運作是一種集體勢力的活動，商業性媒介如此，政論性媒介更為明顯。集體勢力不僅在傳播內容的製作過程中會發生影響力，對傳播者主觀的思想意圖，可能更有

決定性的作用。但「內容分析法」並不能反映這種社會學上的意義，以致解釋力十分有限。

因此「內容分析法」基本上只能視為歸納，整理大量傳播資訊的研究工具，而不能做為綜合分析集體現象的研究架構。換言之，內容分析法的基本價值，在於把量化的概念與技巧帶入傳播內容的研究領域中，使得學者能以較精確的方法處理大量的資料及展示資料的特性，而提高研究結果的「可驗證性」，對於研究結果所注重的解釋及預測的功能，幫助並不大。（註①）

基於此，本論文在研究方法上，是採取思想史（history of intellectual）的研究法。

思想史的中心課題，就是人類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環境（situation）的「意識反應」（conscious responses）。「環境」這個字可以用來指所有的時間與空間之內。人類環境中的所有的特徵，例如人類的生、死、愛等普遍的共同特徵，或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內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的環境。人類總是生長在特殊的社會之中，具有特殊的制度，特殊的文化背景，特殊的思想潮流等等。（註②）

至於「意識反應」也許不是最恰當的名詞，但是事實上它比用「思想」（thought）「理想」（ideas）或「意識型態」（ideology）等名詞要來得恰當。它包括所謂「感情的態度」（emotional attitudes），「感動力」（pathos），「感情的傾向」（propensities of feeling）等等。總之，所有這些我們都可以說，只是人類對它們所處環境的「意識反應」而已。（註③）

至於思想史的理想目標，就是對於他們自己所研究的個人或團體的意識反應，盡可能作「完全」的理解。要達到完全的了解，首先要設法了解他們的觀念，正如他們所了解的一樣。（註④）

在實際的步驟上，就是收集史料中與研究題目有關的事實，儘量「重塑」一個完整的歷史情境，再客觀地過濾、分析歷史事實與意識

反應之間的關聯。在此一過程中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適度運用「透視」（perspective）的方法，當然「透視」法有流於主觀的危險性，但是在掌握住環境本身的真實面目上，「透視」的方法顯然比追溯的看法（retrospective view），更能接近「實際」（reality）。

運用思想史方法來研究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言論，以及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關中西文化的問題，就必須把這兩者表現出來的思想，置諸於當時知識份子所處的生活環境脈絡之中。如此一來，便可以知道知識份子在提出論點時，是如何受到環境的影響，環境包括前代思潮，外來思潮，當時思潮，以及整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環境。

至於為何在當時知識份子提出的衆多論點中，選擇了本論文探討的論點，筆者根據的理由如下：

Karl Mannheim 認爲，一般研究現象時，人們不外乎尋找現象的意義，他提出三種意義，分別為：客觀的意義（objective meaning），表現的意義（expressive meaning），與資料的意義（documentary meaning）。

在此不論「客觀的意義」與「表現的意義」為何，直接探討「資料的意義」。所謂「資料的意義」，它不同於表現的意義，並不關照到行動者本身的心理發展歷程所具之時間序列意義，它所關照的是一系列現象所具本質的意義。譬如畫風。換句話說，資料的意義指涉的現象所內涵的深層意義，乃研究者從現象之中抽解出來，用來代表一個時代的意義。Mannheim 稱之為「時代精神」（spirit of the age），或「時期風格」（ethos of the period）。這也就是說，社會學家把序列的現象當成原始資料，從其間的脈絡關係，抽離出足以用來代表的概念來。（註③）

所以從 Karl Mannheim 的觀點看來，本論文提出的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言論，如果加以誇張理想化，顯然可視為該時代環境的「時代精神」或者「時期風格」。

###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

根據本文的研究主旨與研究方法，筆者擬訂了研究範圍。

如前所述，本文的研究主旨，在於對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言論，作一個客觀的評估。然而，中西文化論戰的問題，基本上是中國百年來（可說是自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之後）在面臨西方優勢文化巨烈衝擊下，所引起的論爭。因此，基於了解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的言論，在整個近百年中西文化問題辯論爭執的過程上所佔據的角色，筆者顯然要將討論的時空拉長至一八四二年，中國進入整個世界體系（world system）以後思想上的變遷。

因此，本文首先探討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之後，所引發的中西文化問題，筆者根據 Karl Mannheim 提出的「時代精神」（spirit of the age）觀點，選擇張之洞的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說」，十教授的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」，陳序經、胡適的「全盤西化論」作為討論的重點。同時在討論這些論點之前，筆者根據思想史的架構，將這些知識份子提出的論點，置放在當時他們生存的時代環境中，這裏所指的時代環境，就是清末民初之時。分析此一時代環境，筆者將從世界體系理論（world system theory）加以探討。

其次，進入本文探討的重點，同樣的根據 Karl Mannheim 的觀點，筆者從文星雜誌刊登的中西文化論戰的文章裏，選擇了李敖以及胡秋原的文章，作為探討的重點。一個不容諱的事實是，筆者在作如此選擇時，顯然必須對同時刊登出來的一些文章加以割捨，而突出誇張李敖、胡秋原兩人的論點。當然，在探討此二人的論點之前，還要依據思想史的架構，將它們置放在其時的時代環境裏面。這裏所指的時代，是從國民政府遷移來台到六〇年代左右。筆者擬從依附理論（dependency theory）來對其時的時代環境加以探討。

最後，筆者擬從文化整體性以及文化變遷（cultural change）的觀點，來評估本文裏提出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言論。

以下是本文的研究架構：

(一)首先，探討清末民初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言論。

1 從世界體系理論（world system theory）的觀點，來探討時代背景。

2 從中國近百年來文化與社會受西方衝擊的變遷過程中，探討中西文化問題發生的起因。

3 提出「本土運動」（nativistic movements）的概念，作為了解中西文化問題各種觀點的一個架構。

4 紹述中西文化論戰的首次交綏，亦即奕訢、倭仁關於中西文化的辯論。

5 提出張之洞「中體西用說」，十教授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」，並敍述其影響。

6 提出陳序經、胡適的「全盤西化說」及影響。

(二)進入主題，探討文星雜誌有關中西文化論戰的言論。

1 從依附理論（dependency theory）的觀點，探討論戰的時代背景。

2 從胡適的「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」演講，探討文化論戰的起因。

3 介紹李敖的「全盤西化論」。

4 介紹胡秋原的「超越前進論」。

5 中西文化論戰的尾聲。

(三)從文化整體性以及文化變遷（cultural change）的觀點，對中西文化論戰觀點加以評估。

(四)結論。指出文化問題的討論，必須具備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，才能從文化論戰的迷霧，看出一個清澈的方向。

## 本章註釋

註①：林毓生，「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」，思想與人物，台北，聯經出版公司，民七十二年，頁一四〇。

註②：郭湛波，近代中國思想史，香港，龍門書店，民六十二年，頁三～六。

郭湛波在該書中指出，思想家的思想形成，固受其時代環境背景的影響；而受其時代的思想影響，尤為直接深刻。近代世界思想之主流，一是達爾文，一是馬克斯。這兩種思想影響了近代世界，也影響了近代中國，而且皆以戰爭為主，但是這兩種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反，從三百篇詩人起，到孔孟老莊楊墨、漢之「黃老」、魏晉清談、隋唐之佛、宋明理學，一直到清代諸儒，無不反對戰爭。

到了近代則思想大變，我們由這裡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特徵，就是「反傳統」。分述如下：第一期：一八四〇～一八九四年。第二期：一八九四～一九二八年（北伐成功）。第三期：一九二八～。

本文探討重點，著重在第二期。第二期思想，自「甲午之役」至「北伐成功」（1894～1928）。這個時期，不過三十餘年，但在近代中國思想史，可稱為黃金時代，對於中國傳統思想破壞最為劇烈，幾至掃蕩殆盡。這個時期思想的特點：①思想的方法——邏輯的重視。②歷史哲學思想的應用。③「民主」、「科學」思想尊崇。④外來思想的直接輸入。本文探討所謂近代思想史關於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，並舉出了張之洞「中體西用說」、胡適、陳序經「全盤西化說」的各家論點，其時

代背景就是置於近代思想史的第二期。

註③：Karl Mannheim, Ideology and Utopia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, London: Rutledgs & K. Paul, 1960, PP. 124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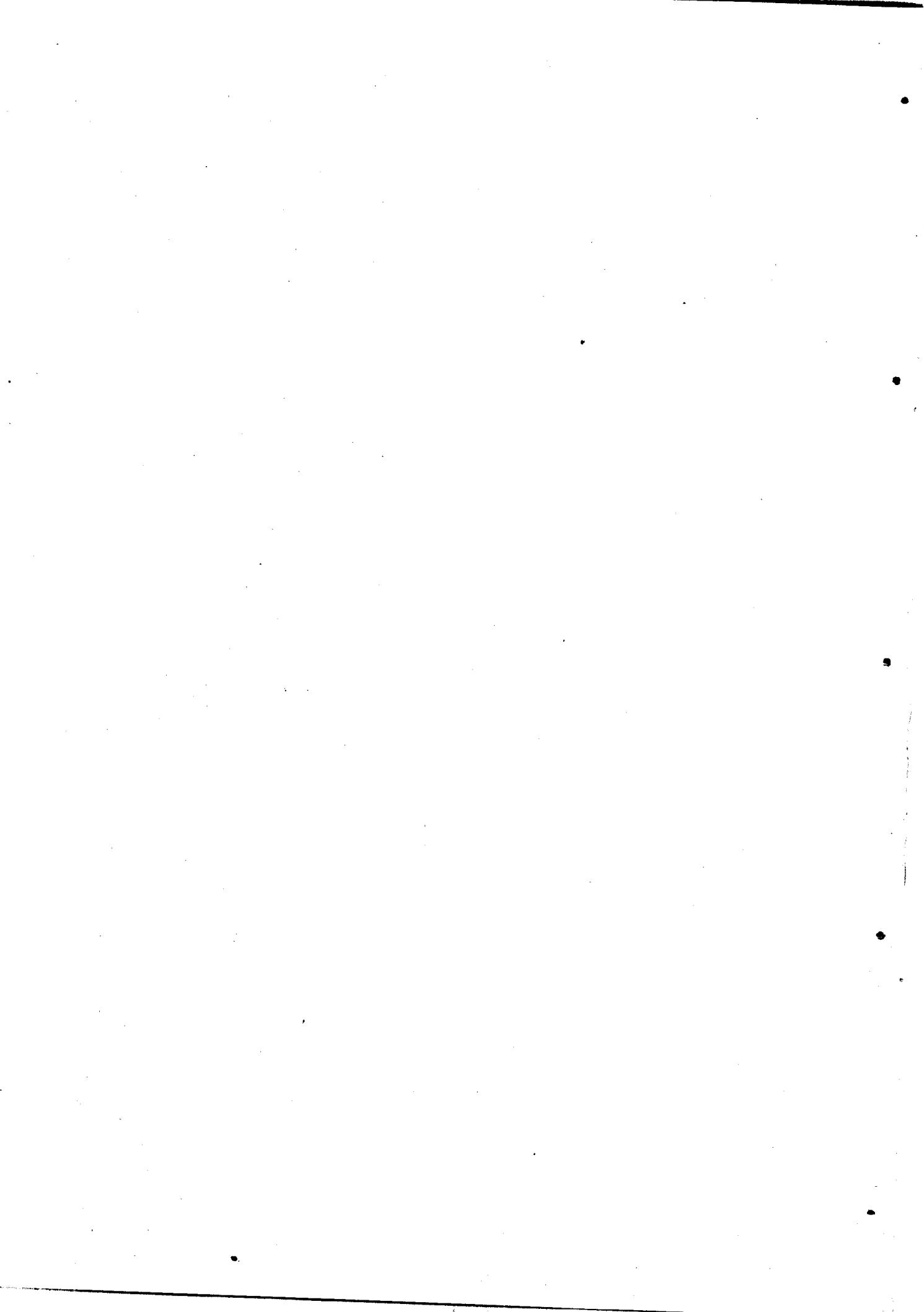
註④：魏誠，民國四十、五十年代台灣政論雜誌的發展——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，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，民七十三年一月，頁五至六。

註⑤：Benjamin Schwartz著，張永堂譯，“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”，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，台北，大林出版社，民七〇年，頁三〇九。

註⑥：Benjamin Schwartz著，張永堂譯，前揭書，頁三一一。

註⑦：Benjamin Schwartz著，張永堂譯，前揭書，頁三一四。

註⑧：Mannheim, K. From Karl Mannheim. ed. by K.H. Wolff N.Y.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, PP. 6—26.



## 第二章

# 近代思想史上關於 中西文化問題之言論

歷史是延續的，但永遠是變的，因革損益，隨時而異，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。就中國而論，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，最為顯著。當時有心之士，已有此認識。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（馮桂芬語）；有人強調為三千年來的大變局，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（李鴻章及王韜、嚴復語）。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，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，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（薛福成語），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，處境大非昔比，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，甚至存亡繫於旦夕。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，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，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，何以不曾使其大變？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？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；縱能憑其一時武力，乘中國之敝，以圖一逞，彼此形勢猶可相持。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。除了強大的武力，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，經濟力量，高度文化，一旦彼此短兵相接，中國的藩籬為之突破，立國基礎為之震撼。於是張皇失措，自處處人，兩無是處，遂陷入悲運。「西洋人之入中國，為天地之一大變」（郭嵩焘語），並未過甚其詞。

—— 郭廷以（註①）